

文庫博物館專集（六十）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押往湖南溁澧农场服刑。这个农场位于常德地区，其实是溁水和澧水环绕的一个江心岛，经劳改犯们多年垦殖

而成，有五万一千亩耕地、一万八千亩淡水养殖水面。一九七一年，共关押劳改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约一万人，有八个农业大队以及水产队、机务队、运输队、加工厂、医院、干部子弟学校和知青农场等直属队，是湖南省公安厅所属诸多劳改农场中的一个，领导机关为场部军管会。

我被分配到一大队四中队。记得到农场的第二天，收工后，我听到监房里有人操着北方口音，我是北方人，久未闻乡音，就过去打招呼。说话的是一位老人，头发已近全白，个头不高，身体很结实。他穿一身破旧的黑色棉衣裤，衣裤上都印着“劳改犯”的黄漆大字，脚蹬一双泥泞的“力士鞋”（一种在劳改队出售的廉价布面胶底鞋），头戴一顶几经缝补的黑棉帽，但那双黑框眼镜后面的眸子，却透着慈祥和智慧。

攀谈中，得知这个老人叫娄瘦平，被捕前在湖南中医学院任教，安徽皖北人，一九零四年出生，这年六十七岁了，我问他劳动上吃得消吗？他说他所在的九组都是老弱病残，比较起来，他还算身体好的。我又问他家里的情况，他摇摇头没回答。当时我真不懂，这样一位大学教授怎么也成了“反革命”？囿于劳改场规定“不准互相谈论案情”，我没问他判刑的原因，那是后来从其他犯人嘴里听说的。

事情要回到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成千上万的教授和学者，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而遭批斗，并同“地富反坏右”这“老黑五类”一道列为“革命的敌人”。娄瘦平已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次再加上“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所谓“双料反革命”，自然在劫难逃。他有一个女儿，当时正上高中，在学校也被红卫兵们骂作“黑五类的狗崽子”，饱受欺凌。就在这时，娄瘦平的妻弟，也是一个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不堪忍受批斗，只身从云南昆明逃来娄家避难。娄瘦平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里还藏得了一个“畏罪潜逃”的人？想想走投无路，妻弟决定铤而走险，南下广州再逃往香港，此事被娄的女儿得知，便执意要同舅舅一道去冒险。娄瘦平只有这么一个宝贝闺女，本是不敢让她去冒这种风险的，可想想眼下自己生死未卜，与其全家守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让妻弟把孩子带走。于是他凑出钱给两人作路费，分手时只对女儿说了一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

两人到了广州，人生地不熟，又不会讲广东话，那时广州大街小巷布满了盘查行人的“纠察队”、“红卫兵”，立刻发现他们两人行迹可疑，将之收容审查。“逃港”在当时虽是风潮，然而一旦被抓获，照样是“投敌叛国”的重罪，结果娄瘦平的妻弟被判刑十五年，女儿也被判了十年。娄本人因为对女儿讲了那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被定为“教唆投敌叛国罪”，判刑十五年，送来这个涠洲劳改农场。他的女儿当时只有十七岁，被送到关门关押女犯人和少年犯的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我们组有个曾在那里关押过的犯人见过这个女孩。

听了他这么惨的遭遇，我很自然的见了他就打招呼，出工前、收工后，也总想跟他聊两句，希望分担一点他的悲痛。他那个组都是老弱病残，常被分派在工棚里干晒谷、晒棉花、棉花分级等活儿，不太费体力，但劳动时间很长，收工比我们晚，我回到监房，总是见他手脚不停地忙着，或翻晒谷物，或修理农具，要不就是搓草绳，有的犯人跟他开玩笑：娄老倌，你这么拼命干活，还想不想活出劳改门了？他笑一笑，仍作他的事。后来他跟我说，一个人闲着，脑子很乱，手脚忙一点，心情反而平静。

我们所在的一大队，位于涠洲农场南部，关押犯人的监房由一正方形的高墙电网围住，西南和东北角还各有一座岗楼，武警日夜站岗。围墙内四栋监房，为四个中队，其中一、四中队是“反革命犯”，二、三中队是“刑事犯”，共一千多人。

我们所在的四中队，又称“农科所”，生产水稻、棉花，还管全农场的良种繁育。下设十一个生产组，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既是劳力强弱的划分，也是吃粮标准的区别，还美其名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犯人的伙食，主要是定量的大米、白菜、萝卜，每月三两肉、三两植物油，但每天被强迫干十至十四小时的繁重劳动，自然不足裹腹，犯人们整天饥肠辘辘。

一九七二年秋收晚稻时节发生的那一次奴隶般的劳役，至今还深刻留在我记忆里。秋收已是起早贪黑了，场部忽然急令各大队抽调劳力烧砖，那是为了给干部们盖大礼堂。犯人既要割稻，也要完成干部规定的额外任务，割稻分配甲等劳力每天三百七十平方米、乙等三百三十、丙等三百，而且必须完成割稻、打稻、脱粒、和草并挑谷到晒坪这四道工序；五个犯人一组，称为一“桶”，分工作业；我是乙等劳力，我们一“桶”五人，要完成一千七百平方米（约两亩半）的活儿，一般都是每天十个小时以上汗流浹背地拼命干，才能完成。如果完不成，干部就勒令这一“桶”犯人“找原因”，挖出所谓“反改造分子”，否则一“桶”人都不准吃晚饭。被挖出的“反改造分子”，要在全中队犯人大会上挨批斗，干部还会剥光他的上衣，用竹扫把猛抽，以“杀鸡儆猴”，这种刑法虽疼痛钻心，却只伤皮肉，不影响第二天照常出工。

这次秋收，娄瘦平他们老弱病残的九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被赶到大田里干活。他们割稻还凑乎，腰疼难忍时可以跪着、坐着割；但要他们这些老人踏人力打谷机可就“死猴子了”（湖南方言“无能为力”之意），用脚踩踏板启动那个沉重的旋转木桶，必须加速到一定速度才能脱谷，操作者一旦同踏板配合不好，人立刻被踏板惯性弹一个跟头，老年犯人操作艰难可想而知。偏偏秋收第一天，四中队指导员汤登和紧跟着下田来检查，此人是涪澧农场造反派头头，一度还夺了场部的权，人称“汤司令”，为人心狠手辣，对犯人骂不离口、打不离手。他到田里一看娄瘦平一组人割稻跪的跪、坐的坐，立刻大骂：“你们这几个老家伙，过去在社会上好逸恶劳，进了劳改队还不思悔改，偷懒耍滑，你们谁见贫下中农像你们这么舒服，坐在地下割稻？”当晚点名时，“汤司令”又大骂这个老弱病残的一组，勒令“找原因”。趁犯人分组讨论的间隙，我劝慰娄瘦平说：“他这是吓唬我们年轻人的”，要他别在意。他苦笑道：“我知道。”几天后，“汤司令”看看从这些老人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才把他们调去翻晒稻谷。

第二年冬二月，为积肥抽干一个烂泥塘，农场干部们都携着蜂拥而至，大声吆喝犯人给他们捉柴鱼、挖鳊鱼，两天后，鱼已捉尽，塘泥中还剩一些莲藕，又细又小，犯人都挖了出来，可干部们已看不上眼，弃之而去。对饥饿的犯人而言，任何能入口充饥的东西都非常宝贵，也常为了争吃一口萝卜菜而斗殴，因偷吃喂猪的生红薯而被毒打。但是，如今面对这些莲藕，我们是又喜又怕，怕的是按监规，未经干部允许犯人吃任何东西，都叫“偷吃农副产品”，是可怕的“重新犯罪”，但我们还是分了这些莲藕，但娄瘦平无论如何不肯领他那一份额。第二天，我见来带队的是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管教干部，就找他请示“分藕”一事，并获得他批准，娄瘦平这才收下他那一份额。

一九七三年四月，我们中队的犯人医生因贪污犯人的零花钱遭撤职，中队干部决定让娄瘦平顶替。犯人医生没有专门的医务室，所有药品都塞在一只小药箱里，这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其实娄瘦平先前当中队的犯人医生，就背着这只小药箱，有一次正值旧草顶监房换新砖拱顶，停电用油灯，有人要止胃疼的颠茄药水，娄瘦平老眼昏花，监房里光线又极暗，不慎认错药瓶上的标签，拿了治外伤的红汞药水给病人，出了“事故”被撤职，大队干部嘲笑他是“红汞药水和颠茄药水都分不清的所谓医学权威”，还组织犯人多次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娄瘦平这次再作犯人医生，非常谨慎，特别在犯人物品保管室清理出一小块空

间，把各种药品分门别类，摆得整整齐齐，不致拿错。他见我脸色蜡黄，就问缘故，我说我在大学读书时染上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还没来得及治，就赶上“四清”下放、“文革”、接受再教育、隔离审查直到被捕入狱、判刑劳改。娄瘦平记在心上，抽空给我认真检查了一次，说我肝区明显有压痛和肿大迹象，便为我争取去场部医院检查，但未获批准。我将娄的诊断写信告诉母亲，她一方面给农场写信以此要求改善我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一方面常年坚持给我寄营养品，救了我的命。

前面提到过，娄瘦平不能一个人闲待着，否则就精神恍惚，夜里也睡不着觉。从一九七三年夏季起，他每晚“政治学习”后，一个人在灯下写东西，有几次凌晨两三点我起身去厕所，都见他还在写，他说他睡不着。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写的内容，但后来听中队干部说，娄是基督徒，他写的东西，一部份是宗教性的认识和人生的困惑，另一部份是“林彪事件”后他对中国前途的担忧。这些文字也统统不知道遗失到哪里去了。

一九七四年元月初的一天，很冷。涇澧农场四面环水，冬季多河，犯人们早晚都用草绳将棉衣扎紧御寒。可那天收工后，我看见娄瘦平正在监房内洗冷水澡，我知道他几十年来坚持洗冷水澡，隆冬腊月也不间断，可那天低温大风，我上前去对他说：当心别感冒。他笑笑道：不要紧，我习惯了。

谁知第二天他真的感冒了。我收工回来去看他，他正躺在床上，说已经服了阿司匹林，要我不必担心。就在那天晚上，他的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送去场部医院后在也没有回来。据大队干部医生说，他是因“突发性脑中风”病逝的。

娄瘦平病逝一年后，一大队调来一位新的干部医生，姓聂，是娄瘦平在湖南省中医学院教过的学生，他说娄教授知识渊博，讲课生动，为人谦和，是学院里最受学生尊敬和喜爱的教授。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也年逾半百，这期间自然是百般奋力，居然从湖南省涇澧农场的—个年轻劳改犯，变成美国博士，每当我在大洋彼岸这里的大学校园里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华裔教授，就不由想起苦难中朝夕相处的娄瘦平来，他亲切的皖北口音，也会在耳边萦绕……。

值此娄瘦平教授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谨作此文以为对他老人家的一个小小的奠祭。愿敬爱的娄教授在地下安息！

□ 原载《民主中国》1999年4月号

~~~~~

【自由论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 余 杰 •

## 一、裂缝之中诞生的恶魔

不久前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不起眼的消息：阿根廷陆军司令承认，军人政权期间阿根廷有3万多人被杀害。1973年3月，阿军人政变推翻庇隆夫人的文人政府，解散议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不到10年间，军人政府先后逮捕5万名左派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学生和市民，他们中的大部份在受尽酷刑后，被装上直升机，分批扔进浩瀚的大洋。在给他们家庭的通知里，只有“失踪”这个最简单的解释。

读到这则报导时，是一个炎热的夏夜。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凉入骨髓的感觉。想

想那麻袋中的活人被扔进大海时的场面，那响彻天空与大海之间的惨嚎仿佛萦绕在我的耳边，那入水时溅起的水花仿佛也飞溅到了我的脸上。我又想起50年前柏林那阴沉沉的地堡里，希特勒向自己的太阳穴开枪的时候，眼光依旧如鹰隼一样冷酷强悍。他是以一种心满意足的而并非绝望的心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他也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虽然死去，但法西斯主义并不像陪葬品一样消亡。法西斯的幽灵将徘徊在整个20世纪人类的历史里。

我宁愿以宽泛的视角，从文化——心理层面来剖析法西斯主义。从中非以吃人为乐的皇帝博萨卡到拉美文豪阿斯杜里亚斯笔下的“总统先生”，从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内核都与法西斯紧紧相联。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历史断裂处，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所共通的缺陷与危机。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在《荒原狼》中写道，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每一种道德风俗与传统都有自己的方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温和与严厉，美好与丑陋。只要当两个时代，两种文化与宗教相互交错的时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失去了一切惯例，一切安全感和纯洁无邪。于是，地狱之门就打开了。这里，黑塞敏锐地预见到法西斯产生的社会基础：动荡时代里失去根基、失去希望、惊恐交加的人群。

20年代末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将恐怖笼罩在每个德国人的头上，经济基础的瓦解引发了上层建筑的崩溃，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神话破灭了，康德那曾被奉为圣经的名言：“人是一种如此高尚的生物，所以他不能只被当作他人的工具”，现在已被雨打风吹去。在风雨飘零、朝不保夕之中，秩序与自由变得无足轻重了。人为的法律最主要的功能是划定某种界限，在界限之内建立起人与人沟通的孔道。而在恐惧中孤立的人误把“界限”当作灾难的根源，在建立新的“最高秩序”时，便在选票上虔诚地填上他的名字——有什么比“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字眼还要诱人呢？即使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如海德格尔、庞德等人也义无反顾地加入这一历史逆流之中。俄国哲学家洛斯基痛苦地检讨这段历史时说：“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自觉服从它。”波兰哲学家柯夫斯基是集中营里的虎口余生者，他的体验更加真切：“恶魔声称他们是出于大爱才对你们行恶，他们要解救你们，给你们提供心灵的帮助，给你们带来伟大的学说，让你们灵魂开启。恶魔这样声称时，他们并没有说谎，他们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并早已打算为自己崇高的事业献身。”那么，这种“崇高的事业”是如何混淆善恶，深入人心的呢？

## 二、“我”与“你们”的深层结构

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地回忆了20年代在德国的留学生活。那和蔼可亲、关怀备至的房东太太，那机灵活泼又带几分忧郁的德国同学，那一丝不苟做学问，把东方青年视若己出的老教授……人们是那样地善良、聪明、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于是，一个最大的悖论产生了：为什么具有高度哲学、科学和艺术修养的德意志民族会被纳粹组织成一架疯狂的杀人机器？为什么平时爱好文学与音乐的市民面对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的悲剧，居然会无动于衷，甚至助纣为虐？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护犹太血统的妻子，因而被解除教职，逐出大学，差点付出生命代价。然而，正是他第一个开始深刻的忏悔。1945年底，在一片废墟与墓碑之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他指出，除了负有法律上罪责的战犯以外，全民族中所有没有公开反对纳粹的人都不可推卸地负有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三个层次的罪责。因为罪责是全民性的，对它的惩罚也是全民性的。这种忏悔已经不仅仅是忏悔了，雅斯贝尔斯将铁锹深深地挖向法西斯主义盘根错节的根系。

希特勒在一次对闪电部队的讲演中，有一句流传甚广却未被深入剖析的名言：

“你们所有的一切透过我的存在而存在；我所有的一切也透过你们的存在而存在。”这里，“我”与“你们”似乎水乳交融，独裁似乎是一种比民主更民主的制度。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伏在观念脚下的民众。有一部德国影片里，集中营的司令官原来是个整天乐呵呵的啤酒商人，他在公务闲暇还自得其乐地教小女儿制作植物标本。然而，一入集中营他便面若冰霜，动辄处死战俘。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是如何统一于一人身上的呢？我们也许觉得难于理解，但法西斯主义轻而易举地将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法西斯主义认为，全权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乎规律的价值根据，他们代表着某种总体的权益，例如德意志民族的振兴、大同乌托邦的实现等等。他们通过恐怖的形式将历史或自然的力量透过人类，而自由自在地运行。因此，有罪与无罪、善良与残暴这类名词变得没有意义：所谓有罪就是指阻碍自然或历史过程的行为，犯有这种罪行的人被控诉为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与消灭他们是自然而然的事。法西斯主义就这样巧妙地完成了对人的精神的整合。

美国作家苏珊娜曾经研究法西斯的美学，她透过希特勒大阅兵的纪录片、欧洲修剪整齐的宫廷园艺、斯大林红场上的群众集会、日本三岛由纪夫和伊朗霍梅尼的个人装束等等，看到了人们心灵深处强烈的生命欲求和对神秘主义的向往。“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今天混在别种名目下的理想：以生命为艺术、迷信美、盲目尊崇勇、丢弃理智、隐身群众消解疏离。这些理想显得生机勃勃，无限动人。”而西班牙作家奥德加则针对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挖掘民族的劣根性：“西班牙是一个一百年来就生活在治理与服从之间良心败坏的国家。”这种中世纪以来形成的波希米亚式的游民风格，正为法西斯的崛起提供了现成的无政府状态。推展开去，这也正是拉美极权主义的渊源。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是现代社会隐藏甚深的一大恶疾。

### 三、记忆与忘却

北大放映《辛德勒名单》时，近二千人的大影院自始至终鸦雀无声，异国的恐怖、异国的灾难、异国的悲剧深深地打动了学子们的心。在惯于用掌声、笑声、嘘声、吆喝声来表达自己情感的北大，极少有哪部电影是在如此静穆的氛围中放映完毕的。在放映《活着》时，北大学生对影片中一个接一个喜剧性的场面：大炼钢铁时沸腾的村庄、用来作订婚礼物的红宝书，婚礼上对毛主席像的鞠躬，大食堂里狼吞虎咽的农民……时而引起哄堂大笑，时而引起掌声如雷，观众比看周星驰的喜剧还要开心。我无意责怪以商业为准绳的张艺谋或影院里年轻的观众们，也不想用时髦的理论来分析这种现象。面对悲喜剧的错位，我不寒而栗了。

乐黛云教授说过，一位德国学者想与她合著一本比较纳粹与文革的书，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短短的30年之间，东西方两大最优秀的民族会发生同样令人发指的暴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回忆是艰难的，在回忆中忏悔与反省则更为艰难。苏联女诗人阿赫玛多娃在《悲歌》中写道，“可怕的叶若夫时代里，我在列宁格勒的监狱中渡过了17个月，某人认出了我：‘你能说明这些吗？’我说：‘我可以！’她那面孔上掠过似笑非笑的表情。”显然，对方对阿赫玛多娃描述历史真实的信念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但是，俄罗斯毕竟有了《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面对文革我们有什么呢？在张贤亮、王蒙这代亲历者自传性的作品里，文革仅仅成为他们品格的试金石，他们以受难者的身份沾沾自喜，灾难像日蚀一样，一旦过去，他们便信心百倍地踏上红地毯。风靡一时的《血色黄昏》处处是暴戾和血腥之气。一个曾经用皮带上的铜扣抽打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的红卫兵这样为自己辩解：“我要说，在红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完全是正常的乃至美好的。我们追随毛泽东的最根本原因毕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灵魂，其外在表现为愚昧、盲从、打架、凶暴，可是他内心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念，斯巴达克的灵魂是

壮美的境界和不屈不挠的追求。”如此混淆目的伦理与实践伦理的自白居然获得了满堂喝彩，巴金所倡导的“全民共忏悔”至今没几个人跟上。没有对自身法西斯毒素的清理，当人们在现实中产生困惑与不满时，文革的惨剧完全有可能以理想和激情的方式重演。福柯不愧为当代危机的最高明的诊断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30年代，面临日寇疯狂进攻，民心全面溃散的局势，钱瑞升、蒋廷黻等学者向蒋介石鼓吹“法西斯救国论”；而面临世纪交替的今天，一些学术刊物又开始讨论“新权威主义”，我们是否应该有某种警觉呢？

二战胜利50周年了，今天的世界并非尽善尽美。南斯拉夫出现了对峙双方杀害战俘的暴行；索马里、卢旺达，难民的生命更是贱如草芥、轻若鸿毛；在中国南方某个开放城市的街头，因为小小的磨擦，一名大学生光天化日之下被父子三人活活打死……在历史的回音壁旁边，我们听到了希魔狰狞的笑声。法西斯的幽灵，依旧徘徊在我们这个太平盛世里。

除了理性与良心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面对“真理”与“正义”的旗帜，我们该作怎样的选择？在核时代的阴影下，每一种选择都将波及“人类是否能继续存在”这一并非耸人听闻的话题。我们有权主宰自己，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恐怖或自由的生活，都将由我们一手创造。我们应当记住——昨天。

□ 摘自余杰著《火与冰——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

∞ ∞ ∞ ∞ ∞ ∞ ∞ ∞ ∞ ∞ ∞

我对文革的看法

• 公 道 •

## 一．文革的主要动因并非权力斗争

国内外很有市场的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是中共最高层的权力斗争；也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等等。席宣和金春明在其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认为，这种观点是对中国政治状况缺少深刻了解的一种误解。以下摘要介绍一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虽然文革一开始就指明了要夺权，那是从广义上由无产阶级夺走资派的权。但是，就毛泽东来说，如果想达到的目的只是排除中央的某些领导，根据他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并不需要兴师动众发动文革。而且刘、邓下台后文革还在继续。显然，毛泽东发动文革要破除的，是他以“左”的目光所看到的弥漫中国大地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况且，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如日中天，没有一个具有正常头脑的人，敢做“彼可取而代之”的梦。因此，毛并不需要为了排除对其权威的挑战而发动文革。

有人断章取义地引用毛与斯诺的谈话来证明毛曾“大权旁落”，所以才要发动文革以夺回失去的权。如果真是毛泽东大权旁落了，他能够力排众议，发动文革吗？说什么“文革是权力斗争的产物，也是权力斗争的工具”这类话，不过是抓住某些表面现象，用资产阶级政党斗争的常规去解释罢了。

在席、金两人看来，文革是在“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中走向极端的。

## 二．文革的思想渊源

当年影响文革指导思想的国际大气候除了美蒋反华势力构成的意识形态压力以外，主要还有以 5 6 年匈牙利事件为开端，以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推行反斯反华政策为高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这种信仰危机不仅使中国受到极大震动，而且也影响了欧洲大陆，给一度深受欧洲青年欢迎的马克思主义造成强大的冲击。在中国正处文革高潮的 1 9 6 8 年，法国巴黎也发生了空前规模的著名“五月学潮”，正反映了这种信仰危机。如何填补因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动摇造成的鸿沟呢？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如同中国的毛泽东一样，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并为此而努力寻求或创造某种新的信仰。

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列维那的与传统革命的“归去来兮”相对提出了“永不回归”说；德里达则提出了“解构”说，也就是说，传统革命的危机在于其理论是建构在由言语按陈规旧习堆砌而成的中心（L O G O S）之上的，只有解构这个中心，人们才能丢掉包袱，获得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求得彻底解放。他们的学说都是在 1 9 6 8 年巴黎学潮以后走红的。其历史背景及反传统精神似乎与中国“文革”的理论与实践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毛泽东则从苏联及欧洲的信仰危机中得到启发，为防患于未然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试图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彻底破旧立新，创造一种全新的信仰，避免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在中国重演。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似乎非常类似列维那推崇的“永不回归”说；他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又似乎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颇有缘份。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说中国的文革是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实践。

问题在于这种永不回归在实际操作中是否现实可行？文革的实践表明，无论是毛的继续革命理论还是法国后现代主义中的“永不回归”和“解构主义”，终究逃脱不了传统革命和哲学的“迂回性回归”的怪圈。最有力的证据是后现代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未能阻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党同伐异”的同化势头。所谓由“同”走向“异”而永不回归，只不过是某“同”扩张成“更大的同”；所谓解构一个中心，只不过是为了重构另一个中心；“归去来兮”的危机早已潜伏其中了。这才是文革失败的深层次的思想根源之一。

## 三．总结文革教训之教训

俺经历过文革，那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毛的初衷当然是要铲除资产阶级腐朽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看上去似乎整倒了一些老革命、老干部，但主要因为这些人只是毛的“民主革命”同路人，革命一旦成功，他们想的就是重建另一座殿堂，就象轮流坐桩一样，可毛不这样认为，他不甘心做改朝换代的另一个君王，也不甘心重建另一套同样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所以他要继续革命。这才有了“文革”以及他所推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要以不破不立的不断革命精神，不惜彻底铲除自己亲手培植的可能会复归原来已被打碎之体制的温床。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是真正的革命家。

但是，尽管继续革命的初衷是好的，实际操作起来就暴露了继续革命理论的空想性和激进性。任何革命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永不回归的。文革也确实有许多过火行为，也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暴行”。可是话又说回来，哪场革命不伴有这样那样的暴行？法国革命没有？美国革命没有？就连英国的不流血“光荣革命”，也把好多人送上了绞刑架呀！关键是能否认真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哪些是失败的，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华？不是全盘否定就能解决问题的。



文革结束了，挨整的人们得到了解放，回过头去把文革一脚踢翻，就因为文革伴有暴行，所以它一无是处，百分之百的错误。谁从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那些当权者又夺回了失去的天堂，只是把那次短暂的失去视为敌人的捣乱。由于一心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们中有的人贪渎起来更是变本加厉。这不是文革的过错，而正是因为有人不思悔改，拒不反省，不能正确对待文革的深远意义所造成的。文革后的共产主义信仰危机也是未作认真的经验总结造成的。

依俺的一孔之见，文革的糟粕是“暴行”太多，宗教狂热肆虐，有点失控。但也不能因噎废食，把其精华也丢掉了。文革的精华就是：当权者莫忘“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宗旨；既使夺取了政权，不能忘了革命初衷是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少数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服务的！如有朝一日丢掉这一宗旨，再来一次革命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

如果文革之后是这样总结经验的，那么，那帮贪官老爷们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因为他们会觉得头上始终高悬着“达摩克里斯剑”。而且，如果对文革所要确立的共产主义信仰加以及时的肯定并加以制度化，那么，如今的“为了升官发财”的目的而入党的党员比例也不至于那么高。当然每个人入党动机不一样，就象基督徒受洗的动机各异一样，不能苛求。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而入党的党员还是有的，就象也有诚信基督的教徒入教一样。有的既使开始并非为了信仰而入，但后来加强学习而做到思想上入教的基督徒也是有的。同理，真正诚信共产主义的党员应该也是有的。只是在当前信仰危机尚未根治的情况下，问题比较严重罢了。总之，以复仇态度对待文革，而不是客观冷静的态度对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反省，取其精华，剔其糟粕，给后来的精神文明重建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也是造成信仰危机和腐败的原因之一。

~~~~~

【人物追踪】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回忆我的朋友王希哲

• 龚小夏 •

我最初见到王希哲，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冬天。自一九七三年底开始，“李一哲”这个名字便越来越多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读过了“李一哲”的一系列大字报：《广东怎么办？》，《革命死了，革命万岁！》，当然还有那篇著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献给毛主席与四届人大》之后，我开始和他们有了往来。

似乎很少有人提起七十年代初、中期的几年里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人中非常频繁的地下或半地下的政治活动。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八十年代以来直至今日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包括民主运动和改革运动——中的大多数人从那时起（有人还要更早）便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甚至组织者。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一是读书，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其次是任何能找到的书，包括古典的和现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著作，数理化、文学作品、外文等等。二是讨论时局，研究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的道路。其中许多人还非常认真地为未来的“斗争”（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会很快有大的变化）作从思想理论到实践活动的准备。“李一哲”们——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那篇轰动全国的大字报便是这类政治活动的产物。

在他们几个人中，我最早认识的是李正天。他祖籍安徽，文革开始时是广东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矮小、秃顶、热情、精力充沛、童心烁然，浑身充满了在我看来很有几分作做可笑的艺术细胞——这就是他最初给我留下的印象。由于个头和

形象的关系，他总有点爱刻意模仿列宁（或者说是电影中的列宁）的举止，而且在那种人人都穿军装胶鞋的火红年代，他竟然无冬无夏著一双皮鞋，因此在文革中得了个“大皮鞋”的雅号，被朋友们当面背后称呼至今。他不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但在读书上却颇肯下工夫。他最得意的时刻，便是当人们谈及某个问题时，他不时会俨然以理论权威的身份宣告：马克思（或恩格斯，或列宁，或毛泽东）在某某地方就这个问题（或类似问题，类似现象）说过，等等等等。由于他的死记硬背工夫，在开会斗争他的时候很令他的对手们头疼，因为每每当对手们得意洋洋地批判著他说的某句话时，他会冷不丁地宣布：这是马克思（或别的“导师”们）曾经在哪里说过的！不过这是后话了。

李正天和我们的几位年轻朋友一同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有位热心的朋友将他的一间窄小的房间“贡献”出来供集体活动之用。每个星期我们在这间小屋中活动一、两次，讨论各种政治、社会问题。每星期都由一人来负责具体的组织讨论，这个人要预先写好一篇文章，届时作讲演，之后大家围绕著他的主题进行讨论和漫谈。我们还一同欣赏当时被严格禁止的古典和现代西方音乐（李本人是一位出色的钢琴手和歌手），互相交换各种文学、政治、历史等读物，我甚至还教人学英文，尽管我的英文也就是刚入门的水平。总之，由于这些政治性和文化性的活动，我们那批苦闷的青年人的生活刹时变得精彩和有意义起来。

七四年秋天一个傍晚的讨论会上，李正天将王希哲带来介绍给我们。四川人王希哲，和矮小的李正天相反，个子高高，漂亮英俊。他的面貌颇有几分条顿人的特点：轮廓分明，线条如刀削一般，特别是那笔直的鼻子配上那对发黄的眼珠子，总让大家伙私下里忖度他的族谱中是不是出现过那么一、两位胡人。他的作派里带有那么几分公子哥儿的味道，漫不经心，大大咧咧。对理论问题，他不象李正天那样爱下工夫，但凭著极好的天赋，却也一贯出语惊人。他是个辩论的能手，反应特快，口才极好，但在没有道理或道理不足时却定要强词夺理。

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讨论的是关于“特权阶层”在中国的存在问题，王希哲是主讲。当时，“李一哲大字报”中提出的中国出现了特权阶层的说法遭到了官方猛烈的抨击。他们的逻辑很简单：说中国的干部中出现了特权阶层，也就是诬蔑中国干部成了剥削、压迫人民的资产阶级，因此也就是恶毒攻击“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说这话的便是犯了“恶攻罪”，便是现行反革命。王希哲引经据典对此进行了反批判。他说，恩格斯晚年在批评英国工人阶级的时候，认为英国工人阶级中出现了工人贵族，甚至还认为英国的整个工人阶级都贵族化了。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首先，无产阶级中是可能出现类似于“工人贵族”这样的特权阶层的。其次，成为特权阶层并非意味著就成了资产阶级，也可以仍旧属于无产阶级嘛！只不过是无产阶级中的特权阶层就是了。

王希哲的这番讲话虽说听上去相当的雄辩，但留给我的印象却颇为不佳。因为在我看来，李一哲大字报中关于“特权阶层”的论述正好击中了当权者的要害，向人民揭露了他们非但不是象自己宣称的什么“人民勤务员”或“人民公仆”，反而是篡夺了权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者、压迫者。将他们说成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不但是替他们脸上贴了金，而且是李一哲们从自己的立场上的后退，是一种对宣传部门那些理论恶棍的示弱和让步。后来，我回家去再仔细读了王希哲提到的恩格斯的那些文章，发现那里面批评的“工人贵族”，指的是英国工会运动中那些排外型的工会，和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中国官僚特权阶层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后来我逐渐发现，王希哲大约是“李一哲”几位中智商最高、笔头子最快、却在理论上又是最不严谨的一个。这在“李一哲大字报”的形成过程中便能反映出来。

所谓“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与四届人大》）的基本观点在七十年代初便开始形成了。李一哲们——除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之外，还有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干部郭鸿志——文革时期同属广东“红旗派”的成员。当时，除了李正天是个颇有点小名气的人物之外，其他几位也都是活跃分子。李正天在广州美术学院，陈一阳和王希哲都是广州十七中学的高中生。李、王、郭三人在文革期间原本有些联系。一九六八年“清队”运动以后，李正天作为“坏头头”被关押进广州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一呆就是四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才释放。陈一阳和王希哲在被作为“坏头头”审查了一段时间后，又都被当时的下乡运动刮到了农村。陈在广东北部的紫金县插队，王到了英德茶场。

一九六八年广州地区的“清队”和“上山下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原来所谓“造反派”的一种惩罚。由于他们在文革中将矛头直指黄永胜和广东地区的各级大小官僚，“清队”中有许多人被整被关被斗甚至被杀。中学里的红旗派学生则多数被分配到了穷山恶水“接受再教育”去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于是开始了包括对文革、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对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种种反思。王希哲和陈一阳在中学时本来就是同一派的好友，到了农村之后便保持了长期的通信，讨论后来反映在《民主与法制》一文中的各种政治和社会主题。那时有志于改造中国的青年人，无论政治观点如何，多少都有几分受毛泽东的影响。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出发点和政治训练的初级班，在那里培养并保持了对待政治理论和独立政治活动的长久不衰的兴趣。

七二年，王希哲作为独生儿子被调回广州，后来被安排到了郊区江村的广州水产制品厂工作，那工厂记得是以生产鱼肝油制品为主的。他在那里的锅炉房当了名锅炉工。

在王希哲回城不久，偶然的机会在马路上遇到了多年不见刚从警司监狱中出来的李正天。老友相见，寒暄不多，他们讨论起了文革以来的形势，立即兴奋地发现双方的共同点竟然是如此之多。首先，几年来的经历和思索，使他们对于自己曾经如此热烈地参加过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根本性的怀疑。特别是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的发生。然而，他们对“文革”的感情却又是矛盾的。毕竟，“文革”中的“造反”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经历。参与“文革”固然出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毛式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念，但是“造反”却给予了他们全然不同的人生经验。在八年以后的民主墙运动中，王希哲这样写道：“毛泽东为了打垮党内民主改革派，实现他个人专制不得不鼓动起人民群众向著他和他的小集团之外的整个官僚阶层发起了冲击，这样就带来了两种结果：一个是毛泽东实现了他个人专制的目的，一个却是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们与中国数千年畏官的传统决裂了，他们在官僚面前再也不感到自卑了，而这正是实行民主改革的精神前提，甚至他们还敢于从制度上来考虑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文化大革命似乎是造成了一代敢于独立思考关心国家大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在那张“李一哲大字报”中写下了这样的字句：“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动，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著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基于共同的信念，李正天和王希哲决定将他们的观点写成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初稿就这样形成了。在写作的过程中，王希哲和他的老同学陈一阳不断地通信进行讨论，这最终使陈一阳成了“李一哲”的“一”，象他自己总

是开玩笑说的那样，他是个“破折号”。

现在回过头来重读《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我依旧为它表现出来的勇气、热情、理想和马克思式的冷静而不容怀疑的逻辑所打动。人们往往感慨说，共产党统治下四十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在理论上没有多大的发展。的确，所谓八九民运中那些林林总总的口号和宣言，有哪一篇能超得过七十年代中期直到民主墙时期的民主运动的理论水平？而民主墙时期的理论与五七年或是更早的知识分子争取民主、自由的呼声相比较，又有什么样长足的进展？然而，从某种意义上，七十年代运动的理论却应该被给予更多的重视和更高的评价。因为那民主自由的呼声是由一群在窒息、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出生、成长起来，对民主和自由非但没有目睹，甚至没有耳闻的青年人发出的。他们曾经是“革命”——或曰共产党专制——的狂热追随者和保卫者，他们就是被那样培养、教育大的。只是在经受了巨大的压迫、痛苦和反省之后，他们才认识到了自由、民主和人权。甚至可以说，他们几乎是独立地发现了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一旦转变，他们便以当初献身“革命”的同样热情献身于民主事业。

七三年成稿的《民主与法制》在七四年被重新修改了一遍，并加上了一个几乎和正文一样长的序言。（顺便澄清一下，那篇精彩的序言主要是郭鸿志的手笔，虽然他的名字没有被列在“李一哲”三个字里。）十一月，在“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中，他们将这篇文章抄成大字报贴在了广州最热闹的北京路和中山五路的交界处。

往下的故事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便不陌生了：大字报被打成“反动大字报”，“李一哲”们遭到批判，赵紫阳出于某种考虑，在批判会上允许李正天进行反驳，使批判会变成了一场场的滑稽剧。这就是当年广东著名的“批李运动”。最终，当赵紫阳在七五年八月被调离广东，广西的韦国清前来接任之后，将李正天和陈一阳发配到了农村和矿山。

王希哲，由于已经有了固定的工作，没有遭到被遣送的厄运。而且，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也许是因为他在“李一哲”中相对年轻？天知道——王希哲甚至不象其他人，特别是李正天，那样被大会小会地批斗。对此，他常常表示遗憾：他那雄辩的口才可有点无用武之地了。也正因为这样，李正天在公开场合那略带呆板的表情常常令他愤怒不已。其实在我看来，书呆子气十足的李正天也许比精灵透顶的王希哲更能赢得群众，尤其是他经常为自己一些强词夺理和恶作剧孩子般地沾沾自喜，大约会让一些老实人感到不那么舒服。记得在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当时全国都在追查一份名为《总理遗嘱》的文件。王希哲单位的领导找到了他，问他见过这份东西没有。王一口答应道：“当然见过。”“在什么地方？”领导马上追问。“越秀山上。”“越秀山的什么地方？”“刻在碑上啊。”他说的是孙中山的《总理遗嘱》。领导自然被气坏了。王希哲为此得意了好些天。

王希哲的妻子在个性上却是一个和他非常不相像的人。她和王希哲本是中学同学。记得他们中不知是哪一位向我描述过，他们的初恋发生在广州烈士陵园的红花岗上，那是在一九六七年，正是文化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刻。当时，苏江的名字还叫做苏令仪。为了赶当时革命的时髦，王希哲要替自己的小爱人改个名字。他没有象一般人一样取些什么“卫东”“向东”之类，而是想出了个别致的花样。苏江——江青的江。这也是一处可以看见他聪明过人的地方。我还就此开过王希哲的玩笑，对他说：“你也可以改名呀！”“改什么？”他问道。“王毛。”王希哲气得直想揍我。

苏江出身于一个医生的家庭，聪明而贤惠，具有传统中国女性最令人称道的气质——外柔内刚。人们见过她后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哪个男人娶上了这样的妻子都是终生享受不尽的福气（这话也许只能由我来说了）。如果没有她，我不知

道王希哲是否还能度过了这前后十四年的监狱生活。

一九七七年一月，当中国人民还沉浸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兴奋中，一场称作“揭批查”的运动开始了。在“文革”中活跃过的人物，特别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对当时的领导权威提出过挑战的人物，无论他们持的是什么观点，又一次统统受到了“专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七四年没有遭到逮捕的李一哲们，这次却被作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势力”被捕，他们的朋友们（所谓“李一哲集团”，包括本人在内），都被“隔离审查”起来。

苏江的家庭在那一段时间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她和王希哲在七六年初结婚，秋天生下了他们的孩子。（王希哲再次证明了他起名字的能力：儿子名王怀舟。既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又有纪念周恩来的隐喻。）当警察来到她家——她和王希哲当时没有自己的房子——逮捕和搜查时，苏江的小妹妹受到惊吓而精神失常。记得那是一个甜甜的、苗条的小姑娘，比我大一岁（那时二十一）。两年后，当我再见到从精神病院中出来的她时，我吓了一跳：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一个臃肿而呆滞的病人。她认出了我，和我打招呼，既震惊又难过的我不知道该如何在她面前表现，匆匆聊了几句便告辞了。后来，听说她自杀了。我始终没敢向苏江询问这里面的详情。

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李一哲”们被释放了。七九年二月，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得到了平反。在那以后，人们便开始各奔前程。我考上了北大，去了北京。时时能接到王希哲的来信，给我寄来他办的民刊《学友通讯》。在这期间，他写下了《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而努力》、《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后来引起了关注的论文。

基于种种个人的或信念上的原因，原来“李一哲集团”的人们绝大部分在民主墙时期没有再介入运动。我也一心忙我的功课去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王希哲介入新的民运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老朋友们的赞同和理解。人们指责他爱出风头，说话不严谨，写文章欠斟酌。当然，这些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却在于多数人对安定的个人生活的向往，和对改革抱有的热切希望。他们——或许我应该说“我们”——不愿意以从事民运的方式来为政府，也为自己，添加一些麻烦。我想，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这也就使得象王希哲、徐文立这些民主运动的积极组织者们显得更加孤独。

八零年六月，王希哲和苏江来到北京，和徐文立等人一同组织“全国民刊协会”。我到火车站去接他，见面第一句话便说：“你要干什么事可别告诉我，我再不愿意去写交代啦。”他的确也尊重了我的意见，从来没有将他的活动向我透露过什么。在他住在北大的那几天里，我还介绍他和王军涛等几个人见过面。想不到，几个月后王希哲便被逮捕判刑十四年；更想不到，九年后军涛也遭到了同一命运，刑期仅比希哲少一年。我们这一代人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就是这样一笔一笔写出来的。

希哲是个个性极其鲜明，对万般事物都充满了几进天真的好奇心的人。对于这种人来说，牢狱生活更为难熬。的确，我们当初这些反叛的人并不同于那种起义的莽汉。我们身上都充满著对生活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种种渴望。我们的自由本来就有限，而对这有限的自由的任何一点剥夺，都会给我们带来几乎是无限的痛苦。阿Q面对枪口无动于衷实在算不得什么英雄业绩，他本来就是一个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都说不囫圇的糊涂虫。李逵那种只会拿著板斧“排头砍将去”的草莽，若要被杀头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一生中已经痛痛快快地“赚”了多少个。象贺龙那样揣著两把菜刀去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的豪杰在从事那杀人的事业之前也早已将脑袋挂到了裤腰上。生命，包括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对于他们是没有神圣的精

神价值的。因而他们在面对死亡时，除了会遗憾它所带来的物质享受的中断之外，并没有太多的痛苦。他们中许多人固然是战胜肉体痛苦的勇士，但那却往往仅仅因为他们在精神上是木讷的白痴。我常常想到瞿秋白。如果要挑选中国共产党中的第一勇士的话，我一定投他一票。

所以，当王希哲再次被捕的消息传来时，我曾经衷心地希望他认错，希望他能争取“宽大”，希望他能借此早获自由。我特别想到了苏江，想到了他们那小名“船船”的聪明可爱的儿子。可是他没有。十二年来，他不断地抗争，不断地上诉，为此遭受了种种残酷的、不人道的惩罚，从没收书报到关小号。整整十二年之后，他终于扬着头走出了监狱。他的妻子苏江，在照顾他的年老病弱的父母、她自己年老病弱的父母、他们的已经将近十七岁的儿子和她那铁窗中的丈夫的生涯中，等待了他十二年。在这期间，她还自修了大学的课程。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工。

□ 节选自香港《百姓》半月刊一九九三年二月

~~~~~

【研究报告】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二十一）

• 宋永毅 • 孙大进 •

### 第十章 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本文）

人们都在关心着四届人大的召开，尤其关心着与每个中国人命运密切相关的国家法制。

人们为甚么这样关心呢？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动荡，发生了一些甚么新的问题使得人们必须关心新的国家法制这个四届人大的产儿呢？

####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斗争：一次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与刘少奇集团的斗争，一次是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斗争的实质是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过去的反右和社教运动也进行了这样的斗争，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么新的问题又是甚么呢？

新的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

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反革命演变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复他们的贵族世袭就是证明。早在流亡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党全国人民警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发生复辟，那就不只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难道不是林彪路线给人民带来的祸害才帮助人们真正开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吗？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到今天的特点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企图是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那么革命人民应当拿起武器去反对他们呢？

##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研究中，毛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式上说，实际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武器。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如说是为了锻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还有甚么能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议论国家大事，批评错误路线更能成为生产力解放的标志呢？

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没有过的，生气勃勃的，这是革命的奇勋。

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毛主席愤慨地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林彪为甚么要镇压人民的民主呢？他们不是还鼓吹过“天然合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么？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林彪及其党徒把人民的革命运动当作他实行篡权复辟的“借用力量”，于是对待“天才”的态度这个准则代替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准则。“共诛之”，“共讨之”和“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原则向法制挑战，成了保卫对“天才”绝对崇拜的上方宝剑。当他的地位一经确立并由党刊宣布以他的地位的确定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标志时，他便要建立“新秩序”了，就要“正名”了。在这方面，他还有他的董仲舒哩！

甚么“新秩序”？就是“最后胜利论”、“四大过时论”、“政权即镇压论”



、“军党论”，总之，就是把我党我军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关系的社会法西斯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否则，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务，相反将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群众获得的只是新的枷锁。

### （三）关于林彪体系

甚么是林彪体系？这是指林彪已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的时期，他在党内推行了那一整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党、全国的东西。这就是哲学领域的唯意志论，历史领域的天才史观，政治领域的政权即镇压论，经济领域的“公产”论和对外关系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天才史观则是其纲领。

毛主席一开始就和林彪体系发生了矛盾，当林彪体系尚未确立时，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便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而林彪体系一旦确立，并使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面临着巨大危险时，这个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

如果我们不去懂得毛主席对林彪法西斯主义镇压人民民主的深恶痛绝，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毛主席为甚么在庐山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斗争所反映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笑话所应当给予我们的教训呢？

“路线斗争不可知”的说法和“路线斗争不过是中央内部的权力之争”的说法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站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否认了一切错误路线，无论是“左”还是右的，给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带来的直接损害。人民群众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总是要以各种形式（甚至包括消极或“反动”的形式）去进行抵制和反抗。中央的斗争无非是社会斗争的集中表现罢了。

### （四）关于批林批孔以来的形势

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动，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启发下逐步地懂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这一次，人民的要求又披着历史的外衣出场了，哲学家作了新的政治变革的前导，这个人是杨荣国。

当“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颈上的深痕尚未消愈，杨荣国和它的助手们甚至是在“牛队”里就开始了他们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这位白发苍苍的教授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揭破了“礼治”秘密，“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杨荣国同志控诉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们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

杨荣国反复地控诉“礼治”，反复地控诉孔子杀少正卯，少正卯有甚么罪？他无非是“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罢了，这样就该杀了么？！

毛主席支持了杨荣国派要革命、要民主的呼声。给李庆霖那封到处谓之“反动



告状书”的复信，是多么大的鼓舞了人民群众啊！真的，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仇恨的呼声喊出来啊！

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锁、恐吓和镇压，李庆霖的遭遇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耽心。他们在说：“幸亏信让毛主席收到了”，他们在想，是甚么压制着他们的民主权利呢？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他们耍了一个诡辩，歪曲主席的思想，把林彪体系实质的极右说成是甚么“右倾”，或者回避林彪在成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他所推行的那一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国的东西，用林彪那些见不得人的反动言论来掩盖林彪见不得人的蛊惑言论。他们站在要求批判林彪体系的人民的反面，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复辟”“反回潮”，好像他们就是革命，动他们不得。

可笑的是他们也来批孔，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被杨荣国揭发出来的“礼治”的秘密，把血淋淋的“礼治”说成是一种假仁假义。肯定焚书坑儒的革命作用使他们自以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专制，非历史主义地鼓吹要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动派，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他们不敢触及秦王朝面临的两个否定：即来自六国旧贵族的反动否定和来自大泽乡农民的革命的否定。农民为甚么要反对秦王朝？秦灭六国时，农民“莫不虚心而仰上”，不都是拥护它的么？因为秦王朝终于损害了农民。人民群众为甚么要反对林彪体系？当年横扫一切的红卫兵运动不是高喊着林彪“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口号去作英勇的战斗的么？也因为林彪体系终于损害了人民群众。几千年来凡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终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这就叫做奴隶们创造历史。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他们客观上要求进步，主观上却不懂得进步而已。这几乎是一个历史规律。被毛主席称为天才的陈胜、吴广，不都是自命扶苏，自号楚王，在反革命复辟的旗号下，举行了他们的革命起义么？既然我们无产者对这样打着反革命旗号的农民起义都要给予他们以历史上崇高的地位，为甚么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在批林斗争中有了一些错误的怀旧情绪，就非大兴问罪之师不可呢？更何况否定之否定，“仿佛是向旧的事物的回复”，不也是列宁的辩证法么？革命的道路要笔直，而笔直是王明的形而上学，对革命作辩证的否定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历史的前进。

当然，如果真正的反革命复辟派孔鲋之流可以混进从大泽乡出发的革命队伍，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反攻倒算和辩证否定，便更可鱼龙混杂。我们必须反对反攻倒算派，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然而，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总之，批林以来的形势，纵横观之，斗争是激烈的，批林整风仍是首要任务。第十次路线斗争尚在继续深入。也许在这种深入之中，它还孕育著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哩！

#### （五）谈反潮流

“十大”废除了林彪塞进“九大”的“共诛之”、“共讨之”的原则，而代之以反潮流的原则。这是“十大”的一个大功绩。

然而，现在情况是一个口号响亮了，人人都来喊：反潮流！

今年（七三）年八月，不是有个张铁生的也出来“反潮流”了么？结果一没有杀头，二没有坐牢，三也好像没有老婆要离婚，反倒是扶摇直上，据说到甚么学府深造“反潮流”的奥秘去了。可是，那些为反对林彪体系作了真正战斗的革命者，不少的情况是杀了头的，头还是杀了；坐了牢的，仍旧坐着；罢了官的，照样罢着。他们哪有那么优哉游哉？“你们是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翻案”、“你们是‘571’”，不对。林彪的“571”不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当作一种“借用力量”去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罢了。“借B52打B52”本身何罪之有？甚至“571”自己也明白那些被损害的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力量呢！

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他们深知所受的根源，它们攻击的锋芒是向着林彪体系，他们谁也没有表现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憎恨，相反，他们憎恨那些歪曲和阻挠这个路线和政策的林彪及其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甚么？你们要民主？你们是反动派！因为你们是反动派，所以不能给你们民主。”他们振振有词，喜欢引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段话。

但是反动派的头上是没有“反动派”三个字的。“只给人民以民主”，很对。可是，你们还为林彪体系大喊大叫时，又给了反对这个体系的人民群众那怕一点民主没有呢？给他们的只是残酷的斗争和拘押呢！“不给反动派以民主”，应该这样。但不要忘了林彪体系风靡一时，甚至庐山成百个中央委员跟着跑，不就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民主么？这个民主不用你给他也有，一他有权，二他有革命的旗号；你不给人民群众，他就没有，一他没权，二他有时也打不出革命的旗号。

历史教训我们，既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派有时会被认为是反动派而没有民主，反动派有时会被认为是革命派而有民主，甚至出现了革命派遭到镇压，反动派青云直上的反常局面。我们必须对谁是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被打成“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分析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对阶级的民主作过许多论述，他们是把整个的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来加以对立的考察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内部的派别斗争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把派别的民主突出地推到了愿意研究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因为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改变成基于团结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派别专政，这个专政派别若是“正确”，它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王洪文同志报告号召人们发扬“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现在的情况，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报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涌来之势的潮流。古今往来，中国总会有人为了说话而不怕杀头的。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哪里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着他

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

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曾经使全世界在它的面前目瞪口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所给予中国的社会深刻震动和它的深远意义，必将影响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

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它将怎样反映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呢？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那么，它所要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新宪法里，它将怎样表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呢？

现在人民群众在想些甚么？要求甚么呢？他们对“全国人民”的代表大会抱着怎样的希望？

##### 一、要法制，不要“礼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造资反线的反”“夺走资派的权”为其基本内容的。但是可以说，镇压（人民民主）与反（资反线）镇压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而且，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中。

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社会主义的，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所形成的传统，顽强地盘踞在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法律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吗？

还有甚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是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了（实际上他是已经实行了）吗？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如果我们不去反对这种封建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礼治原则，我们能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法治真正实行起来吗？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护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这是摆在“四届人大”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不用说党的领导应当细心倾听群众意见，也不用说人民群众对党的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监督的权利，更不用说对走资派造反有理了，即使群众的意见是错误的，过火的，或者对党的政策某些方面不理解而发生不满，难道就可以“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么？而且，香花与毒草、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么容易鉴别的，要有一个过程，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因此，我们不应当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界限是服从纪律不要搞阴谋诡计。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 二、限制特权

承认不承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刘少奇、林彪等不过是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罢了），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

必须首先指出，我们的党员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

“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的现实从哪里来？对社会的产品肆意挥霍，高级的惊人享受，是从哪里来的？相当的部分高干子弟理所当然有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从哪里来的？新资产阶级占有方式和维护这种占有方式的政治手段凭籍的又是甚么呢？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难道我们不可说苏联的演变是从苏联的高级干部实行了高薪制而向资产阶级专家看齐的么？在我们中国，对据说为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干部实行某种特殊的照顾，即使是传统所允许的，老百姓也没有表示多大的异议的话，但是我们能够轻视对政权的腐化作用和对新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么？我们能够对正在产生和形成的新贵族、新的资产阶级熟视无睹吗？

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承认我们社会现阶段存在着种种差别，它并不是一个法令所能完全消灭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是要扩大这些差别而是要消灭这些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甚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

## 三、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一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把林彪这样一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同时，也给人民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呢？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应当怎样才能“千千万万”地涌现出来呢？

使“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

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学活用”（即投机取巧）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毛主席提出了接班人的五条，但林彪也提出了他的三条。在林彪体系得到了确定的那几个年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主要地是用了林彪的三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从天才家族的根苗中挑选的，还是在大风大浪成长，在阶级斗争中涌现的呢？这个问题直到如今理论和实际还是多么矛盾啊？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人民给的。我们的干部不应是做官当老爷，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是权力是最能腐蚀人的。一个人的地位变了，是最能考验他为大多数人谋利呢，还是为少数人谋利？能否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除了他自己努力之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监督。而群众运动是一个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丰富的源泉。

应当怎样规定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权利呢？并且应当怎样明白规定，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呢？

“四届人大”应当回答这些问题。

#### 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我们的宪法、党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写上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是的，写了，不但写了，而且还规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击报复”，“严禁逼、供、信”。可是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中国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纲领，在反动派的手里就变成为对群众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利害的杀人武器。

不惩办一些坚持反革命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血腥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的民愤极大的蒋匪帮，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确立不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巩固的。必须对镇压人民者实行镇压。“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

#### 五、落实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甚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了？

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我们认为“四届人大”应重申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那些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长期实行的政策，并应通过法的适当形式体现出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那些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人应当严肃处理。

#### 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一九六八年夏季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的压制，特别是林彪的法西斯的

组织路线，他们任人唯亲和对逆己势力采取惩罚主义的人事调动，搞大换班，使得“各尽所能”、“任人唯贤”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摧残。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共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险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列宁不是欢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为“伟大的创举”吗？中国的劳动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也涌现了无数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的革命英雄么？这正是极为宝贵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但是，能不能由此而绝对化，认为精神可以代替一切了，可以代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了？显然这是极其荒谬的，它必然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它也已经遭到了惩罚。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反对了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但是我们应当绝对地否定奖金的作用么？一个比较积极、认真负责、超额完成任务或者有所发明创造的工人，为甚么不可以比他的同级工资多得些适当的奖励？一个业余从事写作或者对某一专业有所发现、新发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为甚么不可以得到适当的物质鼓励呢？空头政治的原则是奖懒罚勤的原则。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原则，而且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也是对特权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条文。我们对“四届人大”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希望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开成一个反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群众统一意志和愿望的大会。但是，毛主席在与林彪反党集团激战的关头引吭高唱悲壮的国际歌，已经深深地地震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知道，新宪法的规定只是再次给了我们一个武器，要真正实行还必须靠广大人民自己的斗争。

一九五四年的宪法不是也规定过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毛主席不是还多次说道：“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么？但是，一方面存在着林彪为代表的镇压人民的反民主势力；另一方面也由于人民群众自己对这个民主权利运用得太少了（这是由于中国封建传统的根深蒂固，也由于我国生产还比较落后，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比较缺乏民主精神的缘故），毛主席提出多年的“造成一个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

正如一个南方水乡的客人来到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惜一样，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是在遭到剥夺的时候，才更感到民主权利的珍贵。尽管一九六八年把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革命造反派群众）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现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动派只是一股逆流。”一个彻底摧垮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他们必将重新恢复和发展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精神。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初稿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二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定稿

〔编者按：《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至此已经全部连载完毕。（原书尚有“后记”一文，已经发表于本刊 z k 9 7 0 3 b。）我们再次向该书作者——目

前仍被中国政府拘留的宋永毅先生以及孙大进先生——为“文革博物馆”提供他们的研究成果表示感谢。】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             |            |                                                                |
|-------------|------------|----------------------------------------------------------------|
| 本期责任编辑:     | 华新民 (美 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本期 校对:      | 曾 敏 (美 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读者技术咨询:     | 荣 刚 (美 国)  | <a href="mailto:cnd-help@cnd.org">&lt;cnd-help@cnd.org&gt;</a> |
| 网络技术维护:     | 李健民 (澳大利亚) | <a href="mailto:cnd-info@cnd.org">&lt;cnd-info@cnd.org&gt;</a> |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吕 青 (加拿大)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华夏文摘》主编:   | 李彤彬 (美 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CND》总编:    | 熊 波 (美 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 hz 或 gb-uu 编码版)以及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 请致信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 (WWW) 地址: <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 服务站地址: [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canada.cnd.org](ftp://cnd.org)[142.132.1.13]: pub/cnd/hx

wz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